

立论原理编

“市场领土论”的基本思想

“和争”：“市场领土”立论的时代基础

“市场领土”与“地域领土”：人类活动的双重空间

“引进来”：培育“市场领土”

“走出去”：拓展“市场领土”

体制优化：“市场领土”的实现前提

“市场领土论”的基本思想

●在当代条件下，领土的地域概念正逐渐向市场概念转化。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加大了市场的吸纳能力或资源配置能力，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共同的发展利益。地域领土固然重要，但现时“市场领土”已更重要，经济强大才是国家安全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影响因素。

●一方面应主动地将各国的资源引进到我们这片广袤的空间里竞争，启动经济发展，培育出新的市场，领略现代文明的精神和遵守现代文明的程序；另一方面，应把我们具有独特优势的生产要素推向国际市场，参加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合作与分工，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发亮点和增长面。

“市场领土论”的思想实质就是在当代条件下，领土的地域概念正逐渐向市场概念转化。在经济活动中，“市场领土”重于“地域领土”，市场是人类最重要的、第一位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培育市场领土比守住地域领土更重要，失去市场领土比失去地域领土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国际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渗透，既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更增加了市场容量，加大了市场的吸纳能力或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为世界带来共同的发展利益。

历史已经表明，在当今世界上用军事手段占领别国的地域领土不仅不会发达，反而会背上沉重的政治、经济包袱，一时占有的别国领土也迟早会失去。与此不同的是，靠经济上的市场开拓则可使自身领土获得经济意义上的延伸，获取很多经济利益，并且还正是别国所欢迎的。如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两个带根本性的、互相矛盾的制约条件。一是在十分狭小的领土上，聚集着相当多的人口；二是十分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天然资源、资金和技术。在这两个条件制约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以殖产兴业赶超欧美工业强国、强行加速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战前和战后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战前，日本梦寐以求的是效仿英国，妄图以工业实力为后盾，推行战争扩张政策，在远东建立一个类似大英帝国那样的亚洲殖民主义大帝国，以此确保海外市场，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战败是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它结束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整整一个时代，但并没有打消赶超欧美的念头。他们决意以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为目标，把战争的失败从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挽救回来。正是在这种目标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充分运用“市场领土论”原理，将出口提到“是发展出口，还是等待死亡”的高度予以重视，使得出口发展很快，以致在当今地球上，人们很难忽视日本的

经济存在。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日本以自己琳琅满目、势若奔龙的产品，推动了大多数国家现代化、准现代化的进程，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地平线上标领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新潮。

国际市场是日本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它是日本的“生命线”。战后初期，这条“生命线”是靠“贸易立国”方针维系的。现在则更侧重“海外投资立国”的方针，而海外投资、跨国经营较之对外贸易则是“市场领土论”的更形象、更具体的表现。

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其跨国经营战略的强有力手段。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已经不是单纯地到海外投资办几个厂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层的含义：即把日本企业的经营资源配备到地球上合适的位置上。日本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也就成为各所在国家的法人企业，不仅会得到政治上的保护，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而言会得到更为优越的资金与技术等条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缓解了各国在发展民族经济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会受到欢迎与支持。海外企业不仅是日本本土母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而且也是一个设在各国家的既与有关国家资本联合又向世界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经济实体。从当今日本经济实力而言，越来越需要这样的公司，它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必要步骤。从日本机械出口公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份名为《下一个世纪日本机械产业向国际扩展》的计划中可看出海外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的意向与规模。该计划要求，到 20 世纪末，日本机械由本土出口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则以各种形式在投资中生产，除供应各被投资

① 参阅《战后日本经济》，（日）中央大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国市场外，还销往全球的各个角落，把日本机械企业的经营力扩展到整个地球。所以，日本的“地域领土”虽小，国内资源短缺，但它的“市场领土”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它以扩大出口和创立海外跨国公司来扩展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其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的影响力日趋强大。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日本一直不愿意清算战争问题，其“大国”、“强国”地位便无法获得道义立足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被遏止。一个日常生活中“对不起”不离口的民族，对自己的野蛮屠杀与侵略罪恶不仅没有“谢罪”之辞，而且也无歉疚之意，在逻辑上当然就要让人怀疑它突破军事限制、寻求大国地位的居心和后果了。

从全球的整体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已是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各国开拓海外市场的主力。目前，世界上已有 6 万多家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拥有 85 万家国外子公司。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 60%，它们占据着世界贸易总额的 2/3，控制世界投资的 70%、世界技术创新的 80% 和国际技术转让的 70%。世界上前 100 个经济实体中有 51 个是跨国公司，只有 49 个是主权国家^①。跨国公司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略见一斑。跨国公司以遍布世界的生产资本和经营资本、庞大的销售体系、在各个主要经济领域的积极参与，正在不断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市场格局。

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显示，在当代，市场比领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领土之争世人皆知，然而，日本在领土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拿出巨额资金援助占领自己部分领土的俄罗斯，这在过去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分析日本此举的具体动机，人们看到的是各国经济相互交织、渗透、影响

^① 资料更新来源于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02。

并趋于一体化这一深刻的历史必然，看到了在当今世界上市场与领土的相互关系。领土固然重要，但是现时市场已更重要，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资源，不能没有市场，可以没有政治盟友，不可以没有经济盟友，经济强大才是国家安全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各国经济早已在很多方面超越了领土，地域领土的意义正日趋减小。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出现正显示这一趋势，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出现则强化了这一趋势。与我们中国相联系的事实是，为了培育市场，继海南的洋浦开发区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70 年之后，在上海、西安、厦门、大连等众多的城市，一片片土地的使用权也在批租给境外企业。与此似乎相反的例子是，日本的国策已经明确规定，所有有条件的公司都得尽量在国外购置不动产，为什么要在国外购置不动产？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政治冷战已经被经济热战所代替，这就必须先在最有利的地区培养出市场。购置不动产，正是为一项跨世纪的宏大工程奠基，正是构造跨国经营的重要物质基础。而我们如果真正理解了“市场领土论”的意义，也就不会在土地批租、跨国经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了。

我国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以致我们人均耕地只有 1.5 亩，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3；我国河川径流人均拥有量不及世界水平的 1/4，这和日本的情况很相似。对中国而言，更多占有“市场领土”的压力是经济高效率运作和高效益运转的最大动力。这一种现实危机感不免使人联想到我们的资源和人口的忧患。我们平时议论的所谓“球籍”问题，正是新世纪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领土”问题。改革开放以培育市场，特别是“走出去”跨国经营以拓展市场越来越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考虑发展空间和不能完全按照自己设计的时间表去寻求国

际市场和机会的阶段，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快考虑如何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如何提高资源的配置水平，如何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21 世纪的世界竞争将很可能不再是地域领土的瓜分，而是在一种较为相互平等基础之上进行的“市场领土”划分。这是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的力量必然要引起的经济格局的调整。在这场世界竞争中，我们如果抱残守缺，无所作为，不把市场当做领土对待，或以领土对抗市场，不培育“市场领土”，那么，21 世纪的中国就可能只是被林立的跨国公司的资本所勉强支撑起来的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已。在国际市场的天平上，一个有着全球最多人口的泱泱大国，却远远比不上一个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小国的分量。

所以，我们一方面应主动地将各国的资本、资源引进到我们这片广袤的国土空间里竞争，来启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培育出新的市场，特别是培育中西部大市场，使我们领略到现代文明的精神和遵守现代文明的程序；另一方面，应把具有我们独特优势的生产要素推向国际市场，采取有力政策，进行制度创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兴办各类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要特别鼓励大中型企业积极适应现代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与国际跨国公司密切合作，捆绑发展，参加国际产业链的合作与分工，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发亮“点”和增长“面”。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融入世界，实质上是向世界、首先是向亚太地区提供了无论从地域面积、人口总数、资源丰裕各方面均为世界之最佳的贸易和投资市场，这块市场与其他国家市场的融合，会产生巨大的“ $1+1>2$ ”的互补效应或空隙效应，好比一升豆子与一升芝麻混合后将会产生剩余空间一样，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沟通融合，也会培育、产生出新的市场，即增加市场容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市场将是不

断急速扩大容量的市场。中国人均 GDP 还很低，再增加 10 倍、20 倍、50 倍还不到发达国家的目前水平。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大市场。大容量的多样化的市场，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最有效的优化效应，会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双赢”或“多赢”的积极影响，而不是什么“中国威胁论”。它将会为世界创造出新的世纪辉煌。

“和争”：“市场领土”立论的时代基础

●随着人类文明加速发展时代的到来，和平对抗的方式将被正式从战争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得到专门的研究，这种过程正愈益缩短，和平对抗方式正一天天发展壮大。这就是“和争”。

●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都趋于市场化，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世界经济的竞争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范围与框架内的竞争，是世界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即不同国家之间的体制效率的竞争、体制优劣的竞争、体制质量的竞争。

在前面“‘市场领土论’的基本思想”的论述中，有一个“当代条件”的概念范畴。那么，什么是“当代条件”？我们认为，就是“和争”日益取代“战争”的时代条件，“和争”或“和平与发展”是“市场领土”立论的时代基础。

1. 从“战争”到“和争”

科学研究表明，生物一般都是以种群形式存在的，而一般灵长类动物更趋于结群生活。同一物种的生物由于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最一致，所以它们生活在一起时矛盾必然最突出，相互之间的排他性必然最强，即“种内斗争”最激烈。“种内斗争”既会在个体之间进行，也会在群体之间发生。作为结群性很强、领地观念很重的人类，也同样受到这一自然法则的支配。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进化过程，并不是以突变而基本是以渐变进化的形式完成的。所以不能设想人类昨天还是进行种内群斗的灵长类动物，而今天却突然成了已放弃种内群斗的人。种内群斗的线索不可能突然中断，它只会随着进化过程逐渐地进入不同的阶段。古猴、古猿群间的冲突、争斗，其实就是人类战争的真正摇篮。人类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战争，并不是起源于人类形成之后，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群斗”痕迹，它是人类从猴猿那里带过来的。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是完全平等的，其实不然。科学已证明原始群团中也存在着等级、阶层，那时除了首领以外，许多雄性甚至得不到繁殖后代的机会。原始群团中的这种等级、阶层，实际上是阶级的初始形态。阶级不是陡然而生的，也是“进化”而来的，只不过是历史各阶段中的形态不同而已。人类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群体系统的内部结构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时一个群体系统往往包含若干界限分明的分系统和潜在的分系统，它们之间加强了

垂直或平行的关系，增加了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也用暴力方式解决，战争从此被打上了人们惯称的“阶级”的烙印，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但它的本质——人类群体用原始方式解决与其他人类群体间矛盾这一点，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人类群体系统间矛盾的解决过程并没有完结，新的矛盾还在不断地出现，种内群斗还在继续，早期人类用暴力解决群体间矛盾的方式，由于能满足群体需要一直遗传了下来，并且这种方式由于曾被无数次的实践证明非常管用，所以还越来越被大大强化——高度地工具化、组织化和科学化。但无论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怎样发展，怎样“科学化”，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正义”，都改变不了战争的原始属性。原子弹、导弹，包括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都不过是爪、牙和石器的替代物，现代战争也不过是原始人类遗留下来的一种“活化石”是一种“返祖现象”。

所以，研究如何“不争”是不科学的，理智之举应是研究怎样使人类的争斗变得尽量文明些。

在古代中国，围绕安全等问题而进行的群体间的对抗，曾存在着两大形式，即暴力对抗形式和平对抗形式。官府中在重大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历来存在着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排除主降派）两大势力，即可侧证这一点，并可以反映出和平对抗形式在当时常常可与暴力方式相抗衡，甚至可以解决用暴力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当时，和平对抗形式的内容包括外交斗争、威慑、用韬略瓦解对方、破坏对方战争计划、对抗性的德政竞赛和耕战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构思相当精彩，斗智色彩极强，礼义气味甚浓。这种方式曾经起到过攻伐作用，并成功地制止了一系列战争。例如，烛之武曾用外交手段分裂了晋、秦两国，制止了晋秦盟军对郑国的侵略；西周统治集团曾用文伐手段成功地削弱了殷商王朝的实力等等。此外，古代许多国

家还普遍将广施德政和发展生产作为与列国抗争的基本手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和平对抗方式，其实才真正是中国古代对抗思想和艺术的正宗和精华，它正是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

这种和平对抗方式，其实是善良人类期待已久的可以达到战争目的的非战争方式。由于它产生于人类智力比较发达的阶段，带有较强的文明斗智色彩，它不是动物的遗产而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剔除了战争的简单性、野蛮性和霸道性三大缺点，因而特别适用于社会高级发展阶段中的国际竞争。它相对于战争方式来说，属于一个更高的档次。在社会发展里程上，它是一种高级的、文明的、最有发展前途的方式。

这种和平的、文明的对抗方式至今之所以仍未发达到足以完全取代战争的功能和使世人高度注目的程度，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是人类的文明史才刚刚开始，还十分短暂，人类的文明素质还未发展到足以抑制和替代野蛮素质的程度。此外，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和平”这个字眼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与投降者手中的小白旗联系在一起，虽然历史上有许多主和者（非投降派）成功地避免了一系列战争，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很少有人记得其智名，反却牢记那些甚至给他们带来巨大灾难的主战者的勇功。这种观念，也影响了人们探索和平对抗问题的兴趣，影响了和平对抗方式分离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人类文明加速发展时代的到来，随着和平声浪的陡然升高，随着战争手段对战争目的的愈益不适应，和平对抗、争斗的方式即将正式从战争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得到专门的研究。这种过程正愈益缩短，和平对抗方式正一天天发展壮大。我们将人类群体间围绕各自基本需要而进行的种种形式的和平对抗，统称为“和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了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冷战”的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在“北约”（NATO）和“欧共体”（EEC）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与以苏联（USSR）为首的、以“华约”（1955年）和“经互会”（CMEA）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展开了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全面对抗与竞争，即此时的国际竞争主体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两种制度的竞争，是一种制度要消灭、取代另一种制度的生死存亡之竞争，其结果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1990年10月3日“两德”的统一、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宣告了“冷战”的正式结束。从此，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都趋于市场化，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世界经济的竞争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范围与框架内的竞争，是世界上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即不同国家之间的体制效率的竞争、体制优劣的竞争、体制质量的竞争。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性“和争”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场规模浩大、意义深远的国际性“和争”或经济“热战”已经开始，可以将此称为“第一次世界大和争”。

当代，是地球上所有国家打破封闭状态而进入高度开放、与世界密切接触、对世界吐故纳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激烈的国际竞争已经渐渐与野蛮霸道的行为脱钩。战争在当今与未来时代，已经日益不能满足国家的基本需要，而用“和争”方式却可以较好地达到这些目的，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脱离战争轨道，而转移到“和争”的轨道上来。

战后至今，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国家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战争，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经进入了虽不稳定却是较高级的阶段——初级的“和争”阶段。似乎存在着这种规律：和平不可能在全世界同时实现，而只能够首先实现于一些经济、文化

发达的国家之间。和平的实现过程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而具有时空上的渐进性和不平衡性。

战争本身也在一天天地“变异”，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和争”。近些年来，高度发达的战争艺术已逐渐被移用于经济、科技以及政治斗争领域中。原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一词及其思想方法，已被其他领域普遍接受，“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等词纷纷出现，使用者已普遍感到非如此就无法体现这些竞争领域里存在着的对抗性特点。中国古代的兵法书籍已为日本企业人士所必读。模仿军事参谋组织而建立的各种智囊、咨询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军事思想已开始大规模地“军转民”。通用于各种竞争领域的新的对抗思想及方法，正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综合形成，并使得各种“和争”越“打”越激烈，越“打”越巧妙。

“和争”与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极而言之，在当代与未来，用战争方式已不能使一个国家富强，但是用“和争”方式却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和争”比战争更加适应未来的国际竞争，因而“和争”否定、淘汰战争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否定、淘汰过程自然要以量变为主，但是可以肯定，21世纪在“和争”否定战争方面将不会是与往昔同步的时代，而将是迅猛发展的、以“和争”方式加速淘汰战争手段的阶段。

在复杂、多变的未来发展趋势中，不可否认还存在着一般战争的潜流：战争的经济、科技基础日益发达，核扩散难以制止，小战争频率加快，竞争的激烈也不断激化着新、老矛盾，国际恐怖主义强化等。孤立地看，战争的趋势似乎在一天天加强，然而若将战争趋势与和争趋势比较一番，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正在加强着和争趋势，削弱着战争趋势，从而使战争前景愈益暗淡，由野蛮变文明，而和争趋势之流则由小

增大，由潜变显，逐渐显现成为人们清晰可见的指向未来的巨大路标。即使是前苏联、东欧的“改朝换代”，也基本上是在和平中演变的。即使是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也是在显现着这一趋势，每次战争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仅以百数计，远不如以往战争中的一个小战役的死亡数；而且每次战争的目标主要只是针对某些国家地域领土上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本不伤及平民，且战后进行有序的民主改革和大规模地和平重建以扩展世界的“市场领土”。

所有这些都说明：“和争”时代已悄悄降临。智者们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伟人邓小平将此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是科技立国的世纪，在这一世纪中，可能不是动武的热战，而是动文的科技战。科技的发展要靠人的智力，人的智力要靠制度环境激励。所以，21世纪的“市场领土”的竞争将是科技、智力乃至体制的综合竞争^①。

2. “和争”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对平等化

“和争”时代来临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相对平等化。我们可以粗略分析如下：

首先，一系列国际经济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对平等化。先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它通过三条途径来达到促进商品和劳务在国际间自由转移的目标：一是在取消外汇管制的世界范围货币可兑换性基础上的多边支付体制；二是有秩序地调整有管理的稳定汇率体制；三是成员国在追求国内合理的经济目标时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通过这些途径，虽使美国源源不断向世界各地供给美元，大捞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

^① 参阅齐长明，“下个世纪：和争加速淘汰战争的时代”，未来与发展，1987年第6期。

“铸币税”的好处，但同时却也使其他国家更快地摆脱了战后的经济困境，美国的更多的实际资源也转移到世界各地。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职能也不断演变，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融通资金的作用显著增加。据统计，国际货币基金承贷的贷款总额中 66.7% 是提供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700 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基金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用处是有助于带动商业贷款和其他贷款的流入。这一作用的积极性在解决 1982 年底爆发的举世震惊的“债务危机”过程中最为明显。在 1997 年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目前褒贬不一，但其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再以关贸总协定和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例。它们通过三条主要原则来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一是非歧视性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的原则；二是公平贸易原则，即削减关税、谴责数量限制的原则；三是政策透明度原则。根据这些准则，总协定从 1947 年到 1994 年主持了八轮削减贸易壁垒的贸易谈判。前六次谈判降低税率的范围达 6 万个税目以上，涉及的商品占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第七次谈判减税的商品占世界贸易的 1/5，并就制约非关税壁垒达成了协议；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则更是将规范的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方面，并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这些行动，表面看来最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向世界市场扩张的利益，但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霸权地位也得到了抑制。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国际经济关系相对平等化的含义，应该引起人们更加充分的重视。

世界银行集团的作用更有典型性。1948 年后，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把贷款方向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解决债务危机风潮中逐渐发挥了作用。它帮助重债国把重点转